

皇侃《論語義疏》流傳之檢討

劉玉才

皇侃《論語義疏》是中國南北朝時期義疏體解經的代表性文獻。在《論語》詮釋史上與鄭玄注、何晏《集解》並稱，具有重要地位。北宋邢昺奉敕編撰《論語正義》，成為官學定本，《論語義疏》遂被取代，大約南宋中期在中國失傳。但是在日本方面，《論語義疏》自八世紀傳入之後，不絕如縷，留下不少古抄本。清乾隆年間回傳中國，不僅編入《四庫全書》，還被覆刊出版，在學界引發重要反響。日本學界對於《論語義疏》亦有持續的關注研究，成果斐然。因此，在東亞背景之下討論漢籍的流傳變異，《論語義疏》堪稱極佳個案。

一、皇侃《論語義疏》的中土流傳

皇侃（四八八—五四五），南朝梁吳郡人，自幼好學，嘗師事南朝禮學名家賀瑒，精研《三禮》、《孝經》、《論語》，後為國子助教，講學頗受歡迎，撰著有《論語義疏》、《禮記義疏》、《禮記講疏》諸書，堪稱南朝學界大家。南朝解經崇尚義疏之學，即以經注為依歸，設章分段，層層串講，敷衍彌縫，以求疏解經典義理，內容多有論理問難，頗具玄學之風。皇侃《論語義疏》、《禮記義疏》是南朝義疏解經的代表之作。其中《禮記義疏》與北朝學者熊安生撰《禮記義疏》一起為唐孔穎達《禮記正義》所取資，但是《禮記正義》作為官書通行之後，亦導致《禮記義疏》趨於失傳。今世所傳南北朝義疏之書唯有皇侃《論語義疏》和考證為北齊人所撰《公羊義疏》，

但《公羊義疏》不分章段，而《論語義疏》區分章段，最具義疏體特色，可稱考察南北朝諸儒解經的孤本文獻，彌足珍貴。

隋唐時期，《論語義疏》仍是研讀《論語》的重要讀物，學習之風頗盛。但是唐代是以五經之學為中心，《論語》僅為小經，地位不如《五經》尊顯，故官方未有「正義」之作。延至北宋，邢昺始奉敕撰定新疏，在皇疏的基礎上，又參用鄭玄等諸家注，完成《論語正義》，於宋真宗咸平二年（九九九）上奏。《論語正義》沿襲《五經正義》程式，原本單行，南宋刊本始將邢疏散入何晏《論語集解》各條之下，合稱《論語注疏》，并被列入《十三經注疏》的固定組合。邢疏大量採納皇疏文字，但刪簡其繁難且不合時宜的內容，更適應變化的學風，因而在朝廷敕本的光環之下，迅速成為天下學徒的標準本。相形之下，皇疏、鄭注漸趨邊緣，以至佚失殆盡。

根據歷代公私目錄考察，隋唐以至南宋中期，皇侃《論語義疏》記載不絕。《隋書·經籍志》著錄「《論語義疏》十卷，皇侃撰」，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有云「皇侃撰義疏行於世」，《舊唐書·經籍志》著錄「《論語疏》十卷，皇侃撰」，《新唐書·藝文志》著錄「皇侃疏，十卷」。五代丘光庭撰《兼明書》，引用數條皇疏。北宋邢昺《論語正義》，是以皇疏為文獻基礎。宋《國史藝文志》記載：「侃疏，雖時有鄙近，然博極群言，補諸書之未至，為後學所宗。」（引自《四庫全書總目》）^②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謂《論語義疏》據何晏《集解》而成，又引江熙《集解》等十三家說以廣博異聞。尤袤《遂初堂書目》還有「梁皇侃論語疏」的記錄。但是陳振孫《直

齋書錄解題》已不見著錄，此後公私書目均杳無蹤影^③。學界據此判斷，皇侃《論語義疏》在中土大致亡於南宋中期。清余蕭客編纂《古經解鈎沉》，試圖從《經典釋文》、《兼明書》中輯錄，然僅得寥寥數條。王謨《漢魏遺書鈔》輯錄《論語義疏》一卷，亦無新的收穫。二十世紀初，敦煌藏經洞被發現，法人伯希和從中檢出皇侃《論語疏》殘卷（伯三五七三），存有《學而》、《為政》、《八佾》、《里仁》四篇內容，共計六百四十九行文字。根據卷端、卷背相關信息判斷，抄寫年代應不早於九世紀，但也是《論語義疏》目前唯一的唐寫本子遺，具有標本意義。

二、《論語》在日本的傳習與《論語義疏》的抄傳

中土之外，《論語》在日本亦是流傳有序。《論語》是最早傳入日本的漢籍之一，相傳公元三世紀末百濟博士王仁即將《論語》帶到日本，雖然文獻尚不足徵，但至遲到八世紀，《論語》書名明確記載於正倉院文書，奈良出土的七、八世紀練習書寫的本簡，已有《論語》、《論語集解》的內容。成書于九世紀末頃の《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記錄有《論語》鄭注十卷、何晏《集解》十卷、陸善經注六卷、皇侃《論語義疏》十卷、褚仲都《論語疏》十卷、《論語》六卷、《論語義》一卷、《論語音》一卷等古注本^④，反映出全面受容的態勢。《論語》在日本儒學中被作為根本性經典，居於核心地位，為博士家世代傳習。《論語集解》、《論語義疏》傳到日本的時間大致在唐代，此時中土是以五經之學為中心，但是日本宮中的進講，依舊是以《論語》為中心，絕少涉及五經，反映出兩國儒學崇尚的差異。

日本古代《論語》的受容，嚴格意義講就是《論語》注釋書的流傳與接受。日本《論語》古本，以魏何晏《論語集解》影響最廣，曾長期作為貴族課本流傳。根據現存資料記載，日本鎌倉時代（一二世紀末—一三三三），博士清原、中原家分別有《論語》抄本傳授，南北朝時代（一三三六—

一三九二），清原家較中原家隆盛，中原家的抄本漸趨式微。日本正平十九年（一三六四），以清原家抄本為底本的《論語集解》雕板刊行，這是佛典之外最早的漢籍刻本，史稱「正平版《論語》」。清代回傳中土，被視為《論語集解》的權威文本，清儒詫為奇珍。天文二年（一五三三），日本第二次刊刻《論語》，也是依據清原家的抄本，史稱「天文版《論語》」。當時的讀者群主要是寺廟僧侶，他們廣事傳抄，形成眾多抄本。根據高橋智教授的研究，日本現存室町時代（一三九二—一五七三）《論語集解》抄本即近百部，而考其源流，大致有三個系統：一是根據清原家課本抄寫，二是根據「正平版《論語》」抄寫，三是參考《論語義疏》抄寫^⑤。其中，參考《論語義疏》抄寫系統主要形式是竄入義疏內容，而且多是在寺院抄寫流傳。鑒於室町時代中後期諸舊抄本《論語義疏》與足利學校或其周邊抄寫的《論語集解》等漢籍舊抄本在書式與字形方面頗為相似，高橋智教授推斷《論語義疏》舊抄本當是以足利學校為中心而產生，因此足利學校的學團與學僧在反復轉抄《論語集解》過程中，得以吸收《論語義疏》的內容，從而導致義疏竄入的《論語集解》抄本存在。但是，清原家本在活字印刷傳人之後，據之印行了慶長古活字本，竄入義疏的寺院抄本卻沒有被近世繼承，直到被幕末書誌學者與藏書家所發現。由此也可以推測，日本《論語義疏》主要還是在寺院之間相對封閉的環境里流傳，有別于《論語集解》的主流地位。現存《論語義疏》舊抄本，據影山輝國教授調查，可以確認藏地者共有三六種^⑥。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抄本均為十卷，行格大多為半葉九行，行二十字，反映出具有共同的底本來源。（圖1）

《論語義疏》的舊抄本中，以足利學校所藏最為有名。日本享保年間，古學派代表人物荻生徂徠門下弟子山井鼎（字君彝，號崑崙）、根本遜志（字伯修，號武夷，通稱「八右衛門」）入住足利學校。山井鼎利用其中珍善古本，撰著《七經孟子考文》（荻生觀等校訂補遺），頗為中日學界所重，成為收入《四庫全書》的唯一一部日本人著作。根本遜志在協助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校勘之餘，還謄寫了足利學校所藏舊抄本《論語義疏》。返回江戶之後，根本遜志依據邢昺《論語正義》的體例，仿照明刻注疏本的樣式，對舊抄本加以改編，並略作文字校訂，於寬延三年（乾隆十五年，一七五〇）刊刻出版。刊本定名為《論語集解義疏》，卷首有根本遜志學友服部元喬（號南郭）之序，交代刊刻緣起。此根本本是《論語義疏》首次刊布公諸於世，在江戶時期日本學界頗受關注。自寬延三年刊刻之後，板木多次流轉刷印，

三、《論語義疏》的日本覆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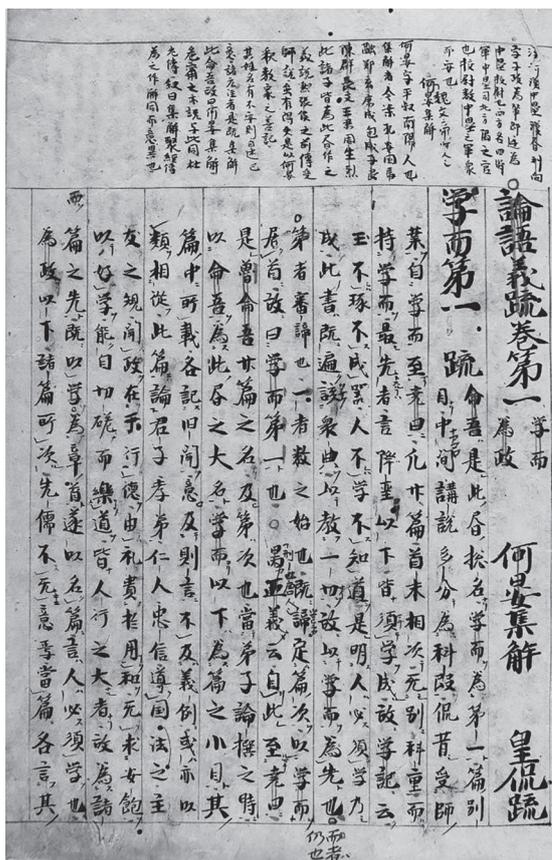


圖 1 足利學校系統鈔本《論語義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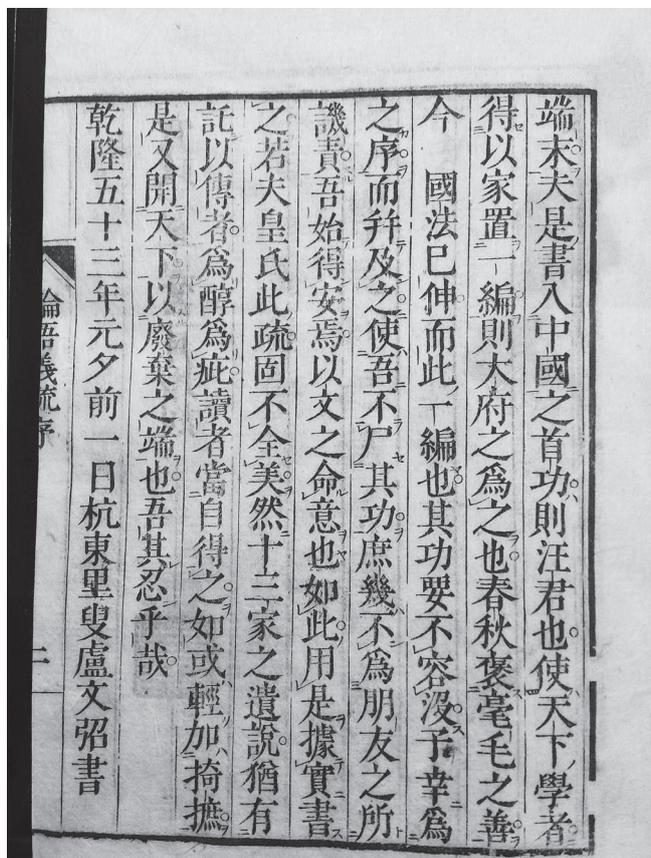


圖 2 日本寬正七年增刻本盧文弨序

且有增刊、補刊本出版。初刻本版權頁有「根本八右衛門校正」字樣，增刊本則有寬政七年春三月刻入的乾隆五十三年知不足齋本盧文弨序，頗可見東亞漢籍流傳之樣態。（圖 2）

《論語義疏》成書一千二百多年來，一直是以若干古抄本的形式流傳，根本刊本改變了其流傳樣式，挖掘傳佈之功至偉，但是在從抄本到刊本的轉換過程中，也改變了其內容結構面貌。根據高橋均的歸納，根本本的主要改訂如下：書名《論語義疏》改為《論語集解義疏》；刪去足利本竄入的邢昺正義；改疏文字句；考慮經、注的搭配，改移疏文；經、注、疏的體裁仿效注疏本形式。武內義雄批評說：「伯修稽古之功偉矣。然其所刊，妄更體式，以就今本，訂譌之際，亦不免師心改竄。」（《論語義疏校勘記序》）此外，根本本也沒有參校其他傳本。有鑒於此，武內義雄選擇首尾完好、

現存有明確抄寫紀年且時代最早的文明九年（一四七七）抄本（文明本）為底本，又校勘寶德本等十種抄本，保存《論語義疏》傳本體式，行格亦沿襲多數抄本作九行二十字，并附以詳細的校勘記，於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由懷德堂紀念會正式排印出版（武內本）。武內本的出版，促進了《論語義疏》文獻學研究的飛躍性發展，雖然還存在參校文獻不完備，以及漏校、排印錯誤等問題，但仍是目前最值得信賴的版本。

四、《論語義疏》的回傳與刊布

山井鼎、物觀的《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於日本享保十六年（一七三二）刊刻之後，次年即流往中國。根據近藤正齋《書籍考》記載，幕府將軍德川吉宗還特意鈐蓋印章，命令長崎的奉行將此書傳入清土。根本本《論語義疏》卷首服元喬序，亦寄望「即傳之海外，而俾知吾邦厚固，有關文明，則伯修之勤有功於國華哉」。服元喬的預期，在根本本刊行二十餘年後得以實現，完成此項使命者為往來中日間的浙江商人汪鵬。

汪鵬，字翼滄，號竹里山人，浙江仁和人（今杭州）人。曾為監生、胥吏，通文墨，擅書畫，有《袖海編》（一名《日本碎語》）等作品。清乾隆年間，往來日本，經商貿易，多次以船長身份到達長崎，並留有文字交往記錄。^⑦李浚之《清畫家詩史》卷丁有小傳，云其「以善畫客游日本，垂二十年，歲一往還，未嘗或輟」。^⑧汪鵬逗留日本期間，頗為留意中土散佚古籍，《古文孝經》、《七經孟子考文補遺》、《論語義疏》均賴其訪查得以回歸。汪鵬友人梁玉繩《瞥記》（《清白士集》卷二十四）摘錄《日本碎語》云：「書籍甚多，間有中國所無之本。……余購得《古文孝經孔傳》及《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傳之士林焉。」《清畫家詩史》稱其「喜購古本書籍，歸呈四庫館，或付鮑淥飲與阮芸臺，傳刻以行世」。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本《古文孝經》跋語有云：「（原本）享保壬子梓行，乃皇朝康熙十一年也。汪君

所至為長崎，距其東都尚三千餘里。此書購訪數年，得之甚艱，其功不可沒云。」

有關汪鵬購歸皇侃《論語義疏》之事，學界已頗有考察，原委大致清楚。即汪鵬應是在乾隆四十三年赴長崎貿易時，將根本本《論語義疏》帶回中國，并呈交給浙江巡撫衙門。時任浙江巡撫王宣望，乾隆四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專折進呈此書，以備《四庫全書》採擇。奏折云：「浙江巡撫臣王宣望跪奏為恭進皇侃《論語義疏》仰祈聖鑒事。竊照浙省商人認辦銅斤，前赴東洋貿易。有商夥仁和縣監生汪鵬，其人通曉文義，從前曾在臣衙門管理筆墨。茲據自東洋回籍，呈繳日本國所刻皇侃《論語集解義疏》一部。」^⑩隨後，根本本《論語義疏》作為浙江採進本繕入《四庫全書》，繕寫之際，省略原本返點、送假名之類符號，并循例改訂了違礙字句。館臣戴震等撰於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的提要，不僅闡明《論語義疏》的佚書性質與文本價值，還對其回歸不吝溢美之詞，有云：「今恭逢我皇上右文稽古，經籍道昌，乃發其光於鯨波蛟室之中，藉海舶而登秘閣，殆若有神物搗訶。存漢晉經學之一線，俾待聖世而復顯者，其應運而來，信有非偶然者矣。」

乾隆五十二年，清內府武英殿又將《論語集解義疏》校訂刊刻（武英殿本）。卷首依次載有皇侃《論語義疏》序、何晏《論語集解》序、《論語集解序考證》、《論語集解義疏提要》，並有「武英殿總裁戶部侍郎臣曹文植、提調少詹事臣陸費墀、侍講學士臣彭紹觀等奉敕恭校刊」題記，各卷之後附有彭紹觀按語考證。版面遵從殿版樣式，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版心上方有「乾隆五十二年校刊」字樣。（圖3）武英殿本因流傳不廣，各家記載互有參差。唯邵懿辰《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標注》準確地著錄為「乾隆五十二年內府刊本」，而且引用朱修伯曰：「日本原刻，每葉十八行，行二十字。內府覆本，用日本紙刷印，殊難辨別原翻之異，惟有乾隆某年重刊一行，為可別識。」^⑪朱語見於《朱修伯批本四庫簡明目錄》「日本紙」作

「日本貢紙」^④。但是朱學動實際沒有比對兩本，武英殿本作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板式、書風均與日本原刻有別。筆者調查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書，共檢得三種武英殿印本，其中紫色灑金紙封面、扉頁染黃紙襯者（索書號SB096.323322），用紙考究，裝幀精美，當屬內府精印，或即朱學動所謂日本貢紙印本。此外兩種為燕京大學舊藏竹紙印本（索書號ZC09332204）和開本略小的普通白紙印本（索書號SB096.323322.1）。武英殿本如此大費周章，亦可見內府對此書之重視。

王宣望在進獻根本本《論語義疏》的同時，亦組織校訂刊刻，以留名於世。今存王宣望重刊本《論語義疏》，為巾箱本形式，卷首依次載有《論語義疏敘》、《論語集解敘》和《皇侃論語義疏新刻序》（附存日本元文），各卷題下，則有「魏何晏集解、梁皇侃義疏、臨汾王宣望重刊」三行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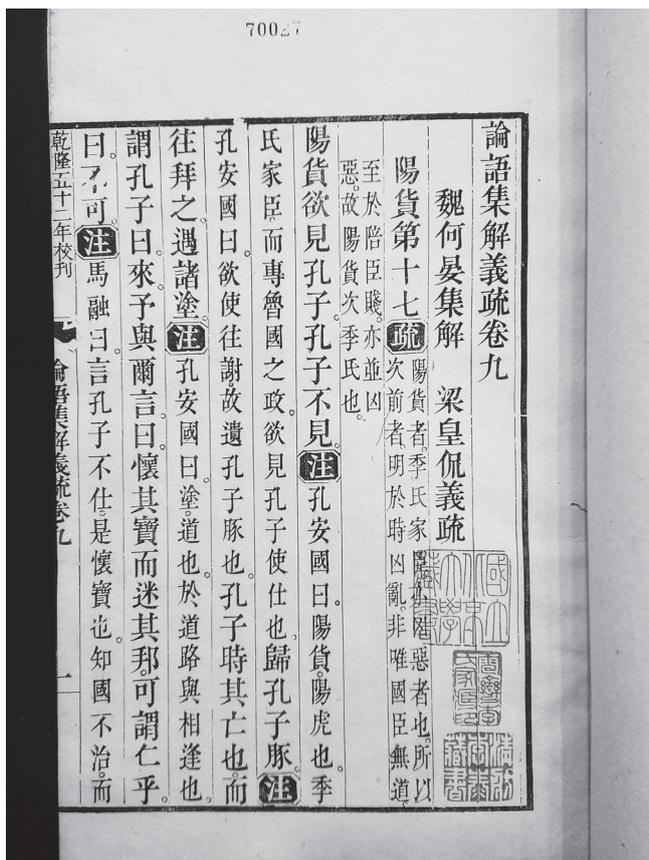


圖3 清武英殿本《論語集解義疏》

行數、字數皆從原刻，只是省略句讀、返點、送假名等符號，甚至「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之類違礙字句義疏，亦未作改訂。各卷之末，均記有校訂者籍貫、姓名。其中卷一題仁和汪鵬；卷二臨汾樊士鑾，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卷三秀水朱休度，詩書傳家，錢儀吉《國朝耆獻類征》有傳云：「乾隆己亥，始獲皇侃氏《論語義疏》於海舶，君因著《皇本論語經疏考》。」其他校訂者仁和孫麗春、錢塘溫廷楷、錢塘汪庚大致為浙江士人，而臨汾王裘、王榮、王焯、王祐（佑）則是王宣望四子，應屬列名性質。王宣望因貪贓於乾隆四十六年獲罪處死，覆刊本當是在此之前面世。（圖4）

王宣望重刊《論語義疏》應是在鮑廷博的協助下，方得以完成。^⑤因此，不僅版刻樣式遵從鮑氏知不足齋刻書，而且原版在剷除王宣望重刊、各卷末校字人名，並依從《四庫全書》文字改訂之後，收入《知不足齋叢書》第七集，卷首有乾隆五十三年盧文弨序。因為鮑氏收藏刻書名重天下，而且交友廣泛，於此書又有刊布之功，所以時人多將《論語義疏》的校訂初刻歸美於他，甚至直接稱之為知不足齋本。如翟灝是較早獲得《論語義疏》進行研究的學者，其《四書考異·總考》曰：「長塘鮑君廷博，槧其副於《知不足齋叢書》中，以初摺本見餽，不啻獲珍珠船也。」乾隆四十五六年間，吳騫與陳鱣、盧文弨、鮑廷博在武林等地頗相往還，並根據從鮑廷博處所獲初刻本《論語義疏》，完成《皇氏論語義疏參訂》十卷，序云：「武林汪君航海至日本得其本以歸，予友鮑君以文讀而異之，亟為開梓，以廣其傳，數百年湮晦之書，一旦可使家學而人習之，謂非治經者一大幸與！」傳增湘舊藏王宣望重刊本《論語義疏》，當為吳騫所據之本，有其朱筆校語卷端「臨汾王宣望」徑改作「歙縣鮑廷博」。（圖5）盧文弨《皇侃論語義疏序》記述刊刻原委甚詳，或近其實。

新安鮑以文氏廣購異書，得之喜甚，顧劄劄之費有不逮。浙之大府，聞有斯舉也，慨然任之，且屬鮑君以校訂之事。於是不外求而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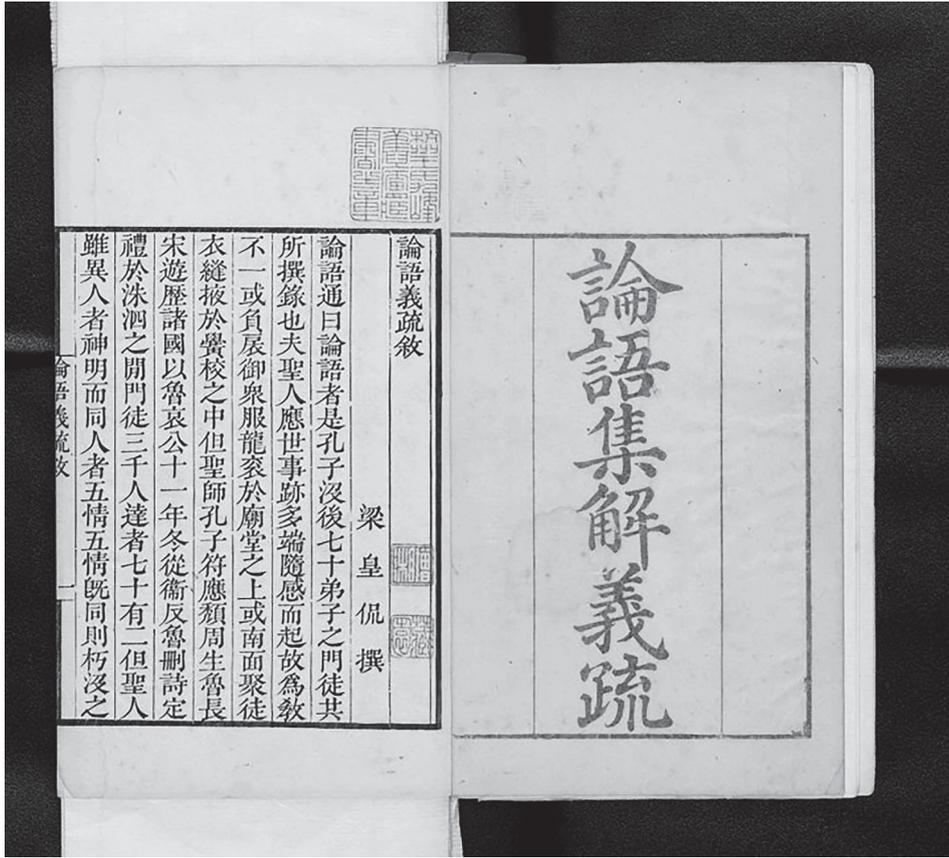


圖 4-1 王亶望重刊本《論語集解義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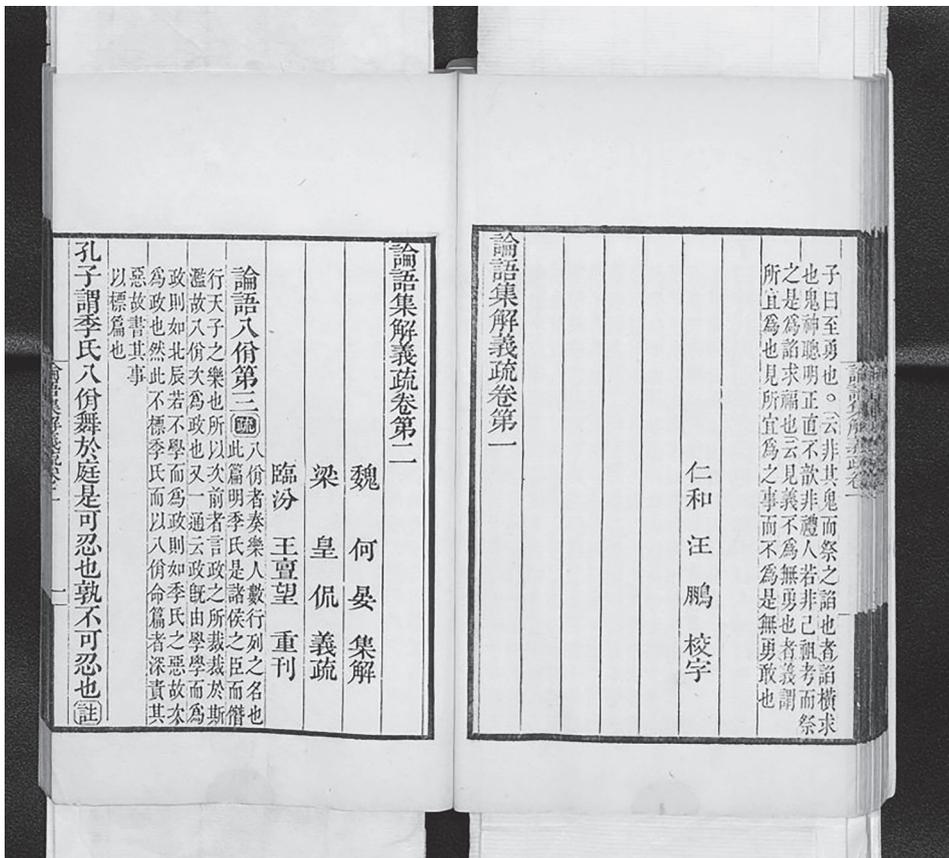


圖 4-2 王亶望重刊本《論語集解義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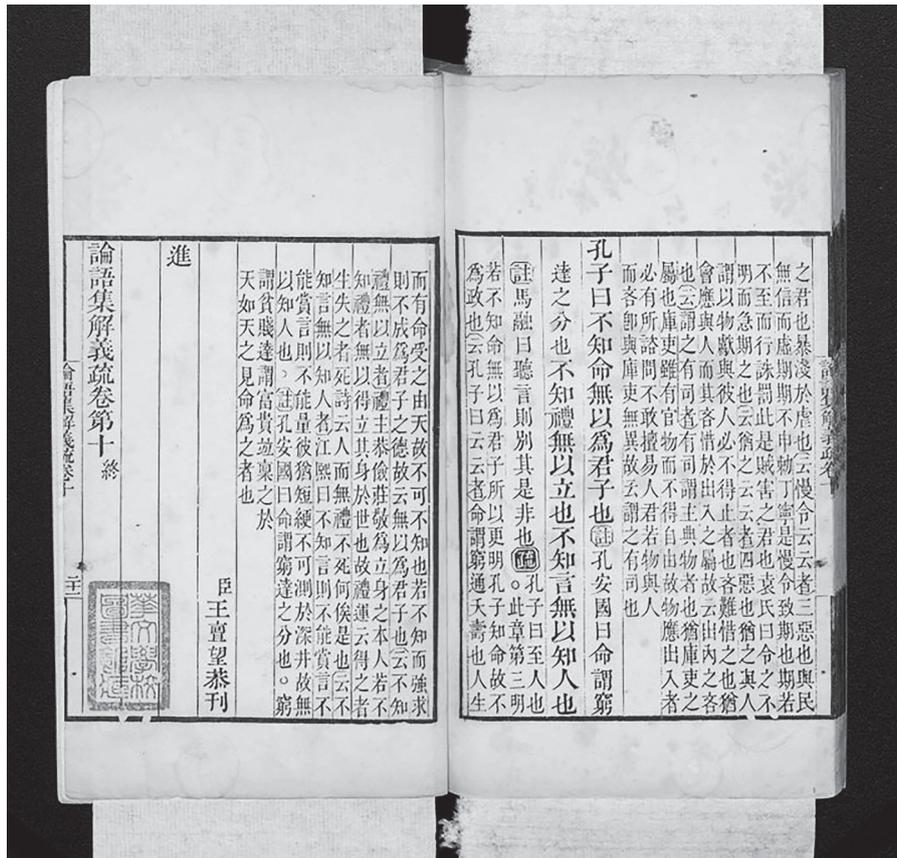


圖 4-3 王宣望重刊本《論語集解義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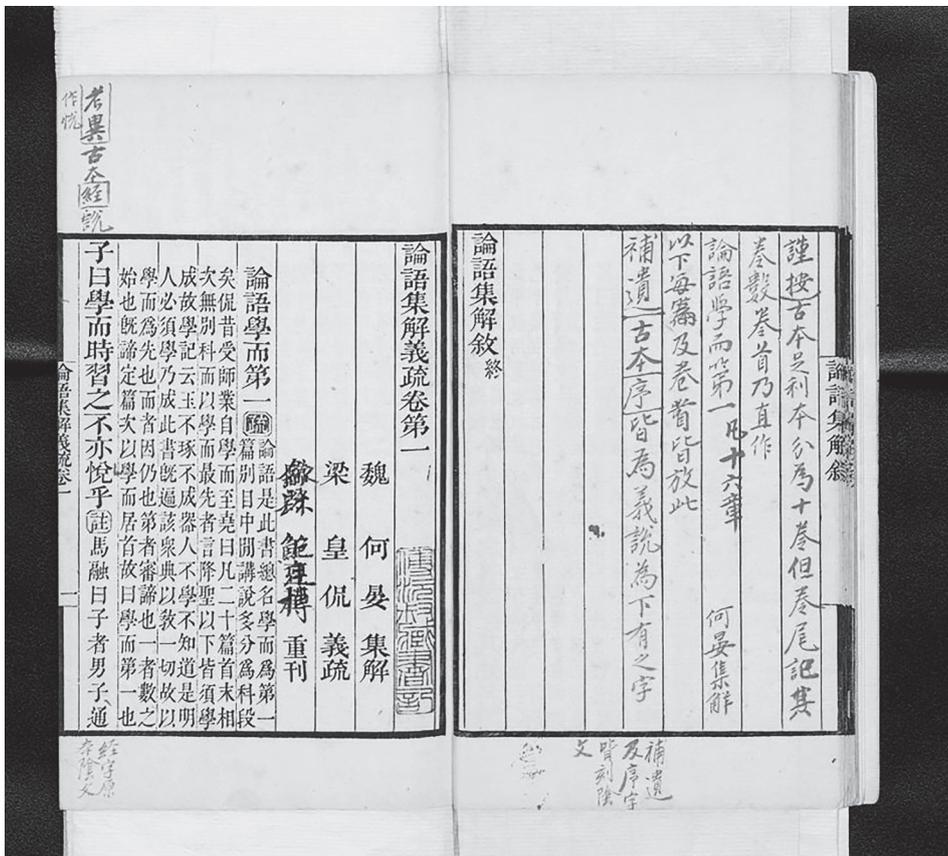


圖 5 吳騫批校王宣望重刊本

已集。既而大府以他事獲譴死，名不彰，人曰是鮑子之功也。以文曰：吾無其實，敢冒其名乎？謂文昭曰：是書梓成時未為之序者，人率未知其端末。夫是書入中國之首功，則汪君也；使天下學者得以家置一編，則大府之為之也。《春秋》褒毫毛之善，今國法已伸，而此一編也，其功要不容沒。子幸為之序而并及之，使吾不尸其功，庶幾不為朋友之所譏責，吾始得安焉。以文之命意也如此，用是據實書之。

《知不足齋叢書》本《論語義疏》流傳甚廣，以至日本寬政七年（一七九五）增刊本，都刊入盧文弼的序言。在國內清末以降，則陸續有粵東書局《古經解匯函》、上海古書流通處等翻印本，本已失傳之書，真正可謂化身千百。

《論語義疏》回傳中土之後，長期以根本本為祖本而衍生，而有關日本古抄本的情況，幾乎無人知曉。吳騫據《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探知日本皇疏有數本，但是仍推斷根本本為新刊定本，而不明其間差異。此後，孫志祖《讀書脞錄》、陳澧《東塾讀書記》均懷疑根本本有日人篡改、妄補之處，亦不斷有學者考證《論語義疏》的真偽問題，但因未得日本古抄本參證，而無法定案。直至清末，使臣東瀛訪書，皇疏抄本樣貌方為中土所知。其中，楊守敬最得風氣之先。今台灣故宮博物院楊氏觀海堂舊藏書中，古抄本《論語義疏》多達七部，北京國家圖書館亦存楊氏舊藏根本本兩部，滿紙日人校語。（圖6）楊守敬兩相對照，豁然明了根本本改竄之非，其《留真譜》收錄室町抄本《論語義疏》書影，有跋語云：

《論語皇侃義疏》為海內逸書真本，無庸擬議。獨恠根本遜志所刊《義疏》，其體式全同閩、監、毛之邢疏本。按合注於疏，始於南宋。今所見十行本邢疏及元元貞刊本邢疏，皆注文雙行。安得皇疏舊本，一同明刊之式？此懷疑未釋者。及來此得見皇疏古鈔本數通，乃知其體式迥異刊本。……足知刊本之妄。且其文字，為根本以他本及邢本校改者，亦失多得少。後有重刊此書者，當據此正之。¹⁶

楊守敬歸國之後，第三任駐日公使徐承祖與公使館隨員姚文棟頗留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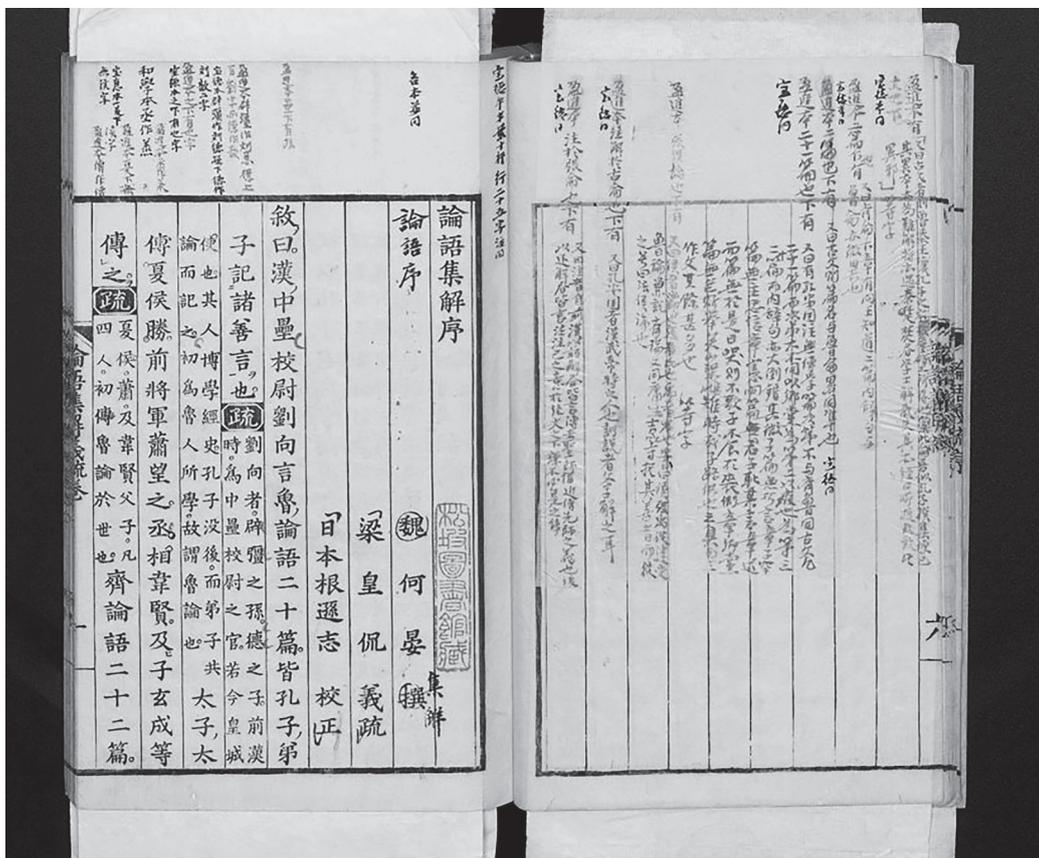


圖6 楊守敬藏日人批校根本本《論語集解義疏》

於中國古籍的流傳，赴任伊始即以公使館名義刊印《經籍訪古志》，向國內傳達日本存藏中國古籍信息。此後，姚文棟應總理事務衙門堂官孫紹經之請，訪查《論語義疏》善本，以作刊刻底本，遂發現足利學校藏抄本與國內翻刊根本本的體例差異。大概因為姚文棟的反饋與推薦，清總理事務衙門遂命駐日公使館與日本外務省、足利學校交涉，借抄足利學校《論語義疏》抄本。有關借抄的詳細情形，陳捷《關於清駐日公使館借抄日本足利學校藏〈論語義疏〉古抄本的交涉》文已進行全面考察，此不贅述。可以補充的是，當年駐日公使館費盡周折借抄之本，經筆者協助影山輝國訪查，已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發現。（圖7）此外，姚文棟曾購得松本家藏《論語義疏》古抄本進呈，影山輝國推測即今存南京圖書館者，但未得目驗。

五、《論語義疏》的文獻學研究

《論語義疏》作為考察南北朝諸儒解經的珍貴文獻，六百年失而復得，其回歸又恰值漢學昌盛時期，因而成為乾嘉學界關注的熱門對象，極大地促進了《論語》注疏研究的開展。最早一批接觸利用《論語義疏》的學者，取得了不菲的研究業績。如翟灝在乾隆四十六、七七年出版的《四書考異》，已經充分利用《論語義疏》材料；吳騫校勘《七經孟子考文補遺》與《論語義疏》同異，附以自己所得，完成《皇氏論語義疏參訂》十卷；陳鱣《論語古訓》匯集古注，《論語義疏》也是其重要的輯錄來源；盧文弨《經典釋文考證》的《論語釋文》部分，多據《論語義疏》訂正《經典釋文》刊本之失，並揭示出《經典釋文》「一本」與《論語義疏》的文本關聯。清中期學界巨擘阮元，不僅最早覆刊《七經孟子考文》，對《論語義疏》也非常重視，將其列為《論語注疏校勘記》的引據本。在阮元創辦的廣州學海堂，甚至專題討論《論語義疏》，《學海堂二集》收錄有鄒伯奇、桂文燦、章鳳翰、潘繼李四人以《皇侃論語義疏跋》為題的論文，內容主要圍繞皇疏的

皇侃《論語義疏》流傳之檢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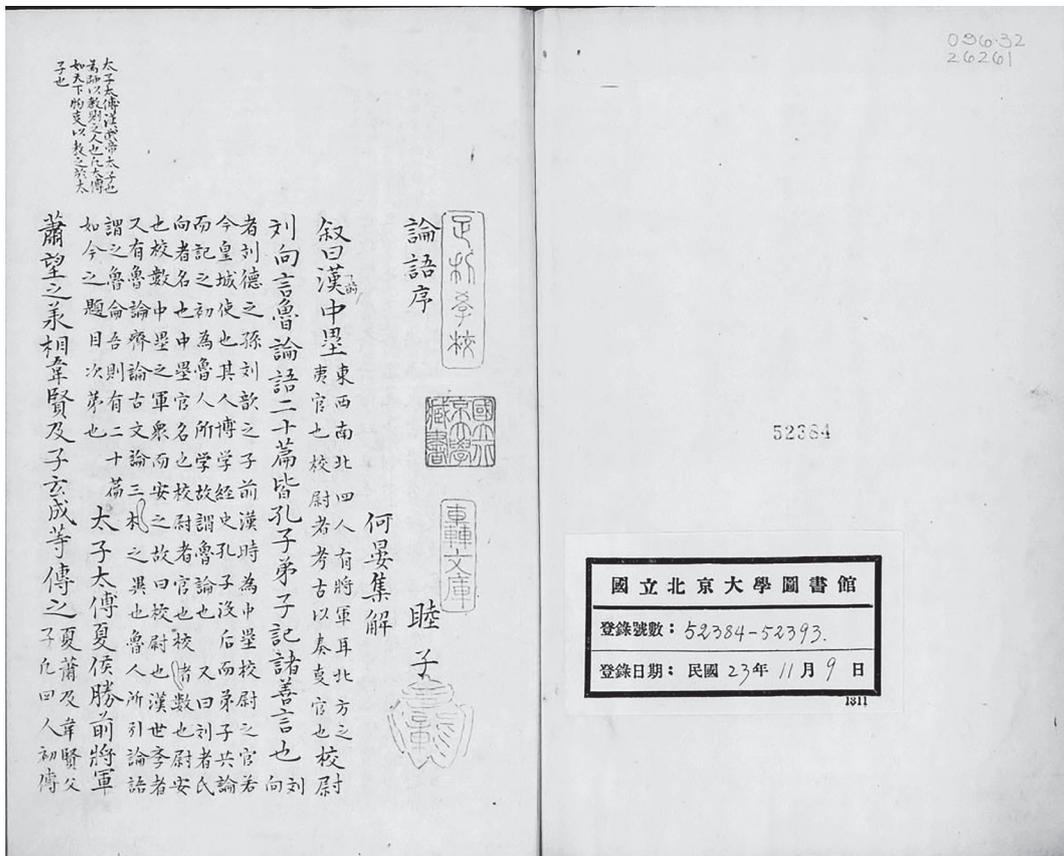


圖7 北京大學藏影足利學校抄本《論語義疏》

疏失，以及破何晏注的問題。其中，桂文燦還撰成《論語皇疏考證》十卷，並將知不足齋本《論語義疏》收入其編刊的《古經解匯函》，擴大了《論語義疏》的影響。此外，清代有關《論語》注疏較有代表性的著作，如劉寶楠《論語正義》、潘維城《論語古注集箋》、馮登府《論語異文考證》，無不是大量利用《論語義疏》，足見其流布之深廣。

對於失而復得的《論語義疏》，在肯定其文獻價值的主流意見之外，清代學者亦不乏懷疑甚至否定的聲音。其中，孫志祖《讀書脞錄》卷二的觀點頗為中肯：

皇侃《論語義疏》十卷，當南宋時已佚，故朱子亦未之見，近始與《古文孝經孔傳》竝得之日本國中。嘗取二書衡量之，則《孔傳》曠而《皇疏》似真也。其中遺文佚事，若管仲奪邑之伯氏名偃、公冶長辨雀語、張石虎難夷齊之類，洵足以資多識而廣異聞，且所采舊說數十家，標新領異，非唐以後人所能偽撰。然經文與今本多異，其合于史書徵引者，固可擇善而從，而流傳既久，亦容有彼國人之竄改，如「子行三軍，則誰與。」《釋文》云：「與，皇音餘。」而今本《義疏》云：「若行三軍，必當與己。」是仍讀如字，而不音餘也。「子溫而厲」，《釋文》云：「皇本作『君子』。」今本《義疏》仍作「子」。吾不能無疑焉。好古之士，當分別觀之，而不徒震為異域之秘書，斯可矣。²⁰

陳澧在《東塾讀書記》卷二《論語》條中，雖然認為《論語義疏》有精當之論，但更列舉文例，批評其疏略，懷疑為「足利人妄補之也」。江藩《漢學師承記》為維護乃師余蕭客《論語義疏》亡佚的立場，則直斥日本傳本為「足利贗鼎」。大概是在陳澧的影響之下，廣雅書院以《皇氏論語義疏真偽考》為題考課生徒，桂坫、祁永膺、傅維森都有同題論文，主流意見傾向真偽參雜。

正如前文揭示，清代學者是依據根本本研究《論語義疏》，並不知曉其

中文本變亂情形，待楊守敬、姚永棟引入日本古抄原本之後，對於皇疏體式的懷疑自然消除。至於孫志祖據《經典釋文》異文而懷疑《論語義疏》文本可靠性，其實亦不足立論。因為《經典釋文》文本本身存在不少訛誤，盧文弨《經典釋文考證》對此已有辨析，敦煌發現的唐寫本也可以對照說明。當然，《論語義疏》在日本傳抄過程中，或有添改變亂之處，但不存在有意作偽的問題。

根本本變亂體式，自不足據，但日本傳存古抄本是否保留了《論語義疏》原貌呢？答案顯然也是否定的。首先，現存日本古抄本除台北故宮博物院藏盈進齋本之外，均有竄入北宋邢昺《論語正義》情形。具體方式，通常都是在皇疏之後空格，然後以「昺云」繼起。高橋均據天理圖書館藏清熙園本《論語義疏》統計，計有一七八條，其他各本大致相同。關於竄入原因，《經籍訪古志》卷二云所見本兩條有「裏云」二字，推測邢疏原本錄於紙背，後混入正文。島田翰《古文舊書考》卷一亦主此說，云是卷子本改裝線縫，不忍棄去背文，姑錄之於皇疏之末。但島田翰所見本下落不明，頗令人懷疑其說。高橋均懷疑「裏云」應是「昺云」之誤。根據藤原賴長的日記《台記》，邢疏傳入（一一五一年）之後，記事有「皇侃疏已下數部類聚之」，或是今傳本之源。皇疏具有集注性質，邢疏傳入之後，遂補入作為一家，與《義疏》一體化。日本國會圖書館藏《論語集解》卷首《論語發題》，為足利學校第七世座主九華和尚（一五〇〇·一五七八）所撰，推測邢疏是日本人所載，當時尚有不載邢疏之皇疏存在。竄入邢疏本各抄本大致無異，稱呼略有不同，當有祖本存在。其次，日本古抄本不僅竄入邢疏，還有竄入朱熹《集注》甚至南宋坊刻纂圖互注本內容的現象。武內義雄分析認為，日本古抄本可以是否受到朱注影響為標準，大致分作兩類。²¹

那麼，皇侃《論語義疏》的原本樣式究竟怎樣呢？楊守敬《留真譜》於室町抄本《論語義疏》跋語有云：「六朝義疏，既有此式，何以唐人《五經正義》皆不循此轍？余疑皇疏原本，亦必標起止，別為單疏。今此式亦

日本人合注於疏者之所為，而刪其所標起止與？惜此間鈔本，審其紙墨筆勢，皆不出元明之世，無從實證之耳。」即認為《論語義疏》原本樣式與唐《五經正義》單疏本相同，經注不錄原文，只標起止文字。武內義雄則認為原本樣式應同於皇侃弟子鄭灼的《禮記子本疏義》，即載錄經注全文，疏文穿插其間，經、注、疏均大字單行，前後空格以示區別。²³

今存日本古抄本樣式為：經文大字、單行；疏小字、雙行；集解注縮格，大字，單行；疏小字，雙行。敦煌本《論語疏》（伯三五七三）則與此差異明顯，其樣式為：經文大字，單行；集解注小字，雙行；疏大字「此」起首，以下小字述該章要旨，接著是經文梗概，然後空格，以下是有關經文、集解注的疏。可見敦煌本分章旨與疏文，分章大致與邢昺疏一致，但有脫落混亂現象。其經文與唐石經、注疏本、日本集解本近，而與日本古抄本差異多。高橋均懷疑敦煌本與日本古抄本源於不同的唐抄系統。²⁴李方認為日本古抄本是皇疏原本樣式，而敦煌本是選疏本，是講經師講述《論語義疏》之際的講經提綱。²⁵高橋均認為正相反，敦煌本具有提問、回答的講述特性，日本古抄本具有記述的特性，應是從敦煌本轉換而成，但是產生時代比較早，保存有源自唐抄本的文本。長澤規矩也另闢新說，推測皇疏原貌雖是單疏本形式，但此形式的抄本未有傳存，日本古抄本或是源自宋刊本底本。²⁶

日本古抄本《論語義疏》到底傳承六朝義疏、唐抄單疏本還是宋刊本樣式，目前還難以達至共識。日本學界，從武內義雄開始，致力於古抄本《論語義疏》的校勘復原，武內本《論語義疏》迄今仍是最為精善的校本。高橋均、影山輝國等學者，都是延續校勘復原的路線，主要圍繞現存古抄本展開研究。其中，高橋均通過日本古抄本與敦煌本的比較分析，試圖探究唐抄本的面貌。影山輝國則以調查現存抄本為職志，進行全面校勘，以補武內本之不備，完成《論語義疏》的定本。但是，正如前文所述，日本古抄本已與原本面貌大相逕庭，基於現存古抄本的校訂，恐怕只能復原到

室町時代抄本的面貌。有鑒於此，近年有學者另闢蹊徑，嘗試利用日本的古典籍所見《論語》注釋資料，探究《論語義疏》的面貌。因為《論語義疏》自八世紀傳入日本，奈良、平安時代在公卿貴族和僧侶間廣為流傳，文字滲透到許多日本古典籍中，通過輯佚工作，可以窺見其早期面貌。當然，這些片段的文字，是否具有代表性，還有待深入解讀。

小結

本文主要是歸納已有研究的成果，以便更好地吸收借鑒，助力開闢新的研究途徑。文章首先探討皇侃《論語義疏》文獻地位的變遷，梳理中土歷代著錄與亡佚狀況；其次，考察日本《論語義疏》的傳播與受容，現存古抄本的狀況，以及根本刊本的緣起；再次，考察根本本的回傳與覆刊，日本古抄本的揭示；最後，基於文獻學史的角度，梳理清代學者的《論語義疏》研究，日本學者的校勘復原研究，日本古抄本與敦煌本的比較研究，並探究近年日本學者利用古典籍輯佚資料考察《論語義疏》面貌的可行性。

附註：此文為中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儒家經典整理與研究」成果。

注

- ① 姚思廉，《梁書·儒林傳》卷四十八，六八〇、六八一頁，中華書局一九七三年。
- ②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經部四書類一，二九〇頁，中華書局，二〇〇三年。
- ③ 明焦竑《國史經籍志》著錄有梁皇侃《論語義疏》十卷但該書所收多有失傳之書，不可信據。
- ④ 小長谷惠吉，《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解說稿》附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第

- 五頁，東京：小宮山書店，一九五六。
- ⑤ 高橋智，〈室町時代古鈔本《論語集解》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二〇〇八年。
- ⑥ 影山輝國，〈《論語義疏》鈔本與根本刻本的底本〉，《從鈔本到刻本——中日《論語》文獻研究》（劉玉才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三年。
- ⑦ 松浦章著、張新藝譯，〈清代帆船與中日文化交流〉，一三八、一四一頁，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二〇一二年。
- ⑧ 李浚之，〈清畫家詩史〉，浙江美術出版社，二〇一四年。
- ⑨ 當為清雍正十年。
- ⑩ 松浦章《浙江商人汪鵬（汪竹里）與和刻本《論語集解義疏》》，《清代帆船與中日文化交流》第三章。周天爽、張昇《關於《論語集解義疏》流傳的三個問題》，《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十六輯，二〇一七年。
- ⑪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硃批奏折·外交類》，此據松浦章文轉錄。
- ⑫ 永榕等，《四庫全書總目》經部四書類一，二九〇頁，中華書局，二〇〇三年。
- ⑬ 邵懿辰撰、邵章續錄，《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一三八頁，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
- ⑭ 朱學勤，《朱修伯批本四庫簡明目錄》，一四一頁，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一年。
- ⑮ 周天爽、張昇《關於《論語集解義疏》流傳的三個問題》，《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十六輯，二〇一七年。
- ⑯ 楊守敬編，《留真譜》，第二二七、二二八頁，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影印版。
- ⑰ 陳文見載《版本目錄學研究》第二輯，三七五、四〇八頁，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二〇一〇年。
- ⑱ 影山輝國，〈まだ見ぬ鈔本《論語義疏》（四）、（五），見載日本《実践国文学》第八四號（二〇一三年十月）、八六號（二〇一四年十月）〉。
- ⑲ 藤塚鄰撰、童嶺譯，〈皇侃《論語義疏》及其日本刻本對清朝經學的影響〉，《從鈔本到刻本——中日《論語》文獻研究》（劉玉才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三年。
- ⑳ 阮元、王先謙編，《清經解 清經解續編》，第三冊，三九七三頁，鳳凰出版社，二〇〇五年。
- ㉑ 高橋均，〈舊抄本論語義疏について——邢昺の論語正義の竄入を中心として〉，《日本中國學會報》四十一集，一九八九年。
- ㉒ 武內義雄，〈校論語義疏雜識——梁皇侃論語義疏について〉，《武內義雄全集》第二卷，第四二九、四三五頁，東京：角川書店，一九七八年。
- ㉓ 武內義雄，〈校論語義疏雜識——梁皇侃論語義疏について〉，《武內義雄全集》第二卷，第四三九頁。
- ㉔ 高橋均，〈舊抄本論語義疏と敦煌本論語疏〉，《日本中國學會報》五二集，二〇〇四年。
- ㉕ 李方，〈唐寫本《論語皇疏》的性質及其相關問題〉，《文物》一九八八年二期。
- ㉖ 長澤規矩也撰，陳捷譯，〈關於《論語義疏》傳入日本的疑問〉，《從鈔本到刻本——中日《論語》文獻研究》（劉玉才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三年。
- ㉗ 高田宗平撰，簡亦精譯，〈日本古代《論語義疏》受容史初探〉，《從鈔本到刻本——中日《論語》文獻研究》（劉玉才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三年。

（中國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